

大学公开选拔副校长的十年轮回

□本报记者 陆琦 实习生 黄仪婷

自2000年以来,华东师范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重庆交通大学等高校都曾选择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选拔副校(院)长。这样的一个选拔相对于以前“闭门”的选拔,具有进步意义。

而有专家认为,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想状态是:高校“去行政化”,取消行政级别的待遇,学校领导不再是官员,包括校长在内的学校领导都通过公开遴选产生。

10月17日,东北大学公布了《关于张国臣同志为东北大学副校长拟任人选的公示公告》,这是东北大学公开选拔副校长的首次尝试。而6月13日,北京语言大学发布公开选拔公告,面向全北京市公开招聘3名副校长。7月8日,经过近一个月的报名、资格审查、笔试、面试、考察、讨论决定、公示及报批等程序后,3名副校长人选正式产生。

8月29日,华北电力大学也开始公开选拔副校长。此次公开招聘副校长,特别之处在于其遴选委员会。这个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,成员包括现任学校党政领导、前任学校主要领导、教授代表、校外专家、学生及校友代表等。

事实上,公开选拔副校长如今已不是一个创举。自2000年以来,华东师范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重庆交通大学等高校都曾选择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选拔副校(院)长。

多赢的公开招聘

从一开始,公开招聘副校长就被认为是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。这也有明确的政策背景。早在1999年,中组部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通知》,提出“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是新时期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一项重要改革,是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有效运用”。按

人物

10月16日,华东师范大学迎来了60周岁的生日。有一位老人,自1952年——华东师大创立的第二年,就来到了这里,一待就是将近60年。他见证了华东师大的成长,华东师大也成为了他实现梦想的地方。这位老人就是我国河口海岸学科的奠基人,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的创始人——陈吉余院士。

陈吉余:这是我对社会的责任

□本报实习生 陆洋 记者 黄辛

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,记者在陈吉余院士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,他端坐在书桌前,虽已满头白发,目光依旧清亮有神。

最初的华东师大很牛

1952年,华东师范大学刚刚创办一年,是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。那一年,随着全国院系调整,31岁的陈吉余由浙江大学地理系进入华东师大地理系教书。陈吉余回忆说:“当时,我和一个同事将浙大地理系的图书设备都搬到了华东师大。”

当问及最初的华东师大如何时,陈先生说,当时学校还不小,只有丽娃河的东面是行政和教学楼,西面的空地正在建设中。那时地理系也不小,办公室只是一座平房。

“虽然条件艰苦,但那附中的华东师大很牛,调整师资力量和复旦大学差不多。”陈吉余回忆说,由于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,除了浙大的地理系外,还有许多优秀高校的学科并入华东师大,所以当时学校的学科背景是很强的。同时,学校本身的教学氛围也很好,教师们对教学非常认真,一心为办好学校,也时常聚在一起探讨如何上好课,因此教学水平基本和复旦大学相当。

陈吉余自豪地说:“在上世纪50年代,华东师大的全国高校排名在第8-10位。1959年学校也被中共中央确立为16所重点高校之一。这都是很厉害的。”

育人六十载 桃李满天下

1958年,毛主席提出了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,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方针,为



董怡辰 / 制图

照文件要求,教育部随后发布了《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在直属高等学校试行公开选拔副校(院)长的通知》。这两份文件,为各地高校公开招聘副校(院)长提供了依据。

公开招聘与以往由上级部门任命的主要区别就体现在公开、自荐、考试和遴选。学校通过在大众媒体上发布公告,向校内校外公布选拔内容。有意者可以通过个人自荐或者组织推荐的方式报名。根据选拔条件获得参选资格的候选人,需要通过笔试、面试等环节。遴选委员会经过考察、讨论和投票,择优录取。

“学校和有关教育管理部门觉得公选副校长具有很大的意义,认为可以把一些有能力的人选拔到副校长岗位上,同时也认为可以促进人才选聘的公开、透明。这样的—个选拔相对于以前‘闭门’的选拔,具有进步意义。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于公开招聘的方式有着自己的见解。

华北电力大学高教所特聘研究员包万平指出,公开招聘一是把教师、学生等放在了主人翁的地位,他们对新的校领导的产生有了话语权,这样就会激发广大师生参与学校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;二是选出来的校长更加符合某个大学的发展实际,容易做到人校匹配,对新校长融于学校发展、制定学校发展政策等有较多好处;三是校内外的民主意识增强,学校发展思维更加开放,对学校朝着民主化法制化发展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有好处。“公开招聘是

一个互动的过程,也是一个多赢的过程。”

包万平还解析了高校公开招聘副校(院)长的几个原因:一是适应民主社会进程,推动大学民主管理、依法治校的需要;二是试图化解大学行政化之困,向还原大学学术本质、回归教育规律努力;三是走群众路线,拓宽选择大学校级领导的视野,吸引和凝聚优秀人才为大学发展服务;四是为公开招聘大学校长、党委书记等重要干部探路,以适应人事体制改革、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。

根本之计仍在“去行政化”

不过,包万平觉得,这几年国内高校公开招聘副校(院)长的标准还有一定的改进空间。

目前,各高校设定的任职资格中往往要求博士学位,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以及一定的年龄限制,有的高校还提出只有院士才有报名资格。在包万平看来,把学术能力与能否胜任校长职务画等号是一个误区。

“这些看似‘苛刻’的条件,其实只是用来区分差与一般的条件,是区别能不能完成本职工作—个基础条件。而要选择真正优秀的校长,则需要考虑胜任力,才能够区别—般与优秀。”包万平认为,我国大学校长的选聘,有必要从学术考察转移到胜任力考察上来,重点考察对大学的综合经营能力、战略眼光、改革创新能力等等。

“情绪智力”是包万平想到的另一个重要考核标准。“情绪智力的高低是校长领导水平的决定性因素。”

华北电力大学在此次公开招聘中,让参选人公开演讲自己的治校设想、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思路等。“这是一个好现象,期待未来有更大突破。”包万平说。

熊丙奇则悲观得多,他认为公选副校长并没有解决现在大学效率管理和行政上的问题,而且很有可能导致新的问题。

“按照《高等教育法》规定,副校长的人选实际上应由校长提名,其实就是校长负责制。而校长要对学校的办学质量负责,学校的行政人员就应该和他一起作为一个团队来对学校负责,这就相当于国外的组阁制。如果副校长由公选产生,就出现—个问题:有可能校长是作为遴选委员会的一个成员,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票的权利。一旦校长对别人选不满意,但是由于组织部门或者其他人投票选举了这个人选,校长没有办法反对;这样,新的副校长不对校长负责,而是对上面的行政部门负责。这就造成了一个困境,整个校内领导班子不团结。”熊丙奇解释说。

“高校‘去行政化’,取消行政级别的待遇,学校领导不再是官员,包括校长在内的学校领导都通过公开遴选产生。”这是熊丙奇心目中高校人事制度改革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想状态。

中国大学评论

“严厉监考”与 学生人格修养

□王长乐

日前到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办事,正赶上该校在组织年度研究生招生考试,在笔者所办事、也是作为考场的教学楼门口,不仅有众多保安在严查考生,而且有许多监考人员在考场及楼道中巡视,还有电子监测车在考场外活动(屏蔽或监测电子信号),其戒备森严状态似临大敌。过后笔者询问参加考试的学生,进入考场是否要进行“安全检查”,学生答:“与乘机安检和奥运安检—样。”

这似乎是一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,因为现在的考试监考几乎都是这样的。而且在承担各种社会性考试频繁的大学中,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监考经验,相关部门运作起来都驾轻就熟。在防止作弊的宣传方面,可以说更是非常熟练。在考场外的标语牌上,既有谆谆教导和劝告学生不要作弊的警句和口号,也有申明惩罚方式、用来威慑作弊的各项条例。其“恩威并用”的良苦用心,真让人感慨万千、五味杂陈。试想,这些神情严肃、如临大敌的监考者在监督谁呢?是大学现在或者曾经的学生。难道说他们在大学中的数年学习,竟然没有修养出能够让人信任的人格素养吗?

由于监考组织严密和技术提高的背景,一般是以考试作弊现象普遍、作弊程度严重、考生诚信意识淡薄、道德素养不高为前提的,因而严厉监考的现象表明,如今高校中的考试作弊现象已经非常严重,而且导致高校进入了一个作弊与反作弊的怪圈:由于作弊现象严重,因而要加强监考;由于严厉监考预示着学校对学生信任度的降低,进而会减弱学校对学生良好品格养成的影响力,因而教育离自己“培养人才”的目的和本质可能会越来越远。而这,是在说明目前的大学教育成功呢,还是在说明大学教育失败呢?

这显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,因为人类教育的经验表明,人的良好品质一般都是在自由、公正、理性、文明的环境中自发生长起来的,而不可能是在权力、权威、强力支配或压制下被动形成的。惩罚和控制只能使人的意识更逆反,使人更倾向于暴力和虚伪,甚至将投机取巧、见风使舵当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,形成以他律、他主、权宜为基础的被动性人格,而不会使人形成以理性、责任、自律、宽容、友爱为基础的自主性人格。所以,教育天然地应该是一种说理性、熏陶性、示范性的活动,而不能是一种威慑性、强制性、引诱性的活动。而大学中的考试监考对大学生而言,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教师教学行为或学校的教学管理行为,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教育活动,以及学生的人格熏陶活动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国外的许多大学在考试中,都推行一种激励学生自觉、自律的“荣誉规则”,引导学生珍惜“荣誉”,杜绝作弊,进而养成自律人格。而我们大学中的严厉监考现象,以及其依据的高压和惩罚意识,显然是与教育的精神意蕴背道而驰的,依靠它,不仅无法营造出色的教育风气来,也无法培养出注重责任、权利的合格公民,以及具有社会担当的精英人才。

众所周知,大学教育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,是人生受教育的最高阶段或最后阶段,也是学生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,学生在本阶段形成的人格形态,很可能就是他们即将带入社会的人格形态。那么,大学期望学生带什么样的人格到社会上去呢?是带一种积极、自尊、负责、理性、自律的人格到社会上去呢?还是带一种他律、他主、权宜、从众、功利的人格到社会上去呢?这显然是任何一所大学都应该认真对待的严肃问题。

基于民主素质只能在民主的环境中锻炼和养成、高尚的人格只能在高尚的氛围中成长和修养的人类经验,大学生的自主性人格也当然只能在自主的环境中训练。而为了促进学生自律、自主、理性、荣誉人格的形成,大学就应该在这方面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教育和训练。大学中的监考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一部分,无疑也应该充分地体现人性,体现学校对学生的信任,让学生在被信任、被尊重的氛围中,来形成他们遵守社会规则的自律精神,成熟他们的社会责任感,坚定他们的诚实品格和人生信念。

在此需要说明的是,笔者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所有的监考,而是反对那种对学生“如临大敌、戒备森严”的监考,因为—是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,其活动目的中无疑包含有培养学生自觉遵守社会规则的内容。而基于暴力环境容易形成人的暴力倾向、文明环境才能形成人的文明意识的原理,可知学生自觉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 and 能力,只能在被信任、被尊重的环境中形成。笔者以为,目前大学中的严厉监考现象,是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养成的。二是这种监考的立足点是“管理”,而不是“教育”。虽然从教育管理的角度看,严格监考是必须的,甚至应该“宁左勿右”,越严越好。但如果从教育工作的角度看,这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。因为这种做法会在学生的人格养成上形成障碍,会对其健康心理形成产生消极影响,使学生精神上难以养成自觉为社会负责的意识,使教育背离自己的本性和宗旨。

对于学生考试作弊行为普遍及程度严重的问题,不应该简单化地借用社会管制的逻辑,企望用严厉监考的方式解决,而应该在教育思想和制度中寻找原因,包括反思考试的内容和方式,并力图用教育的方式、亦即通过提高学生人格水平的方式来解决。当然,这其中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是,我们的教育应该走导出致教育本性迷失的行政主义逻辑,让教育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活动,从而使教育活动建立在坚实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之上。



陈吉余

长江口深水航道,在口外深水域建一个人工岛,把横沙东滩广甜的滩涂吹填起来,与原有的横沙、长兴岛一起,有可能形成一个约500平方公里的河口串珠状岛群,这就是长江口亚三角洲,将来可以在这里建深水大港,建新的开发区。

陈先生兴奋地说道:“这是多么美好的前景,这样未来上海就有发展空间了。”

2000年,进入耄耋之年的陈先生,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:每年完成一件事。回首这11年,陈先生说:“我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。我对实际问题有想法,有科学思想,还是会去推敲、去研究,这是我对社会的责任。”

搞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实际问题

“我对陈先生60余年的地学成就,非常敬佩、感触最深的有—点。其中—点就是:陈先生

积极服务社会发展,用于建言献策,善于与政府沟通,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。”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在《心系河口海岸——恭贺陈吉余院士九十华诞文集》书中这样写道。

“搞研究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实际问题。”陈吉余说,在我国考核—个科研人员就是靠论文,论文写得再好,若不能解决实际问题,又有什么用呢?

陈先生在60年的科研历程中,始终身体力行,解决了许多工程建设中的实际问题。其中,最具影响的就是“浦东机场的外移和九段沙引鸟”的建议和“长江河口建设青草沙江心水库”的建议,前者为国家节省了3.6亿元投资和大量土地,开创了大型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先例;后者为上海市解决水源开辟了新途径。今年青草沙水库通水了,若没有它,上海的老百姓早在今年5月就得喝海水了。

如今,91岁的陈先生依旧放不下我国河口海岸的发展。他说:“长江的水资源丰富,大家都在抢水,那么谁来协调?现在缺乏—统—的管理。无序用水对河口水资源带来了—很多不确定的因素。”

陈先生在今年年初率先提出了长江口亚三角洲的概念。这一概念若付诸实践,有可能极大地丰富上海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,为上海缓解土地资源、港口资源等方面的战略性困难,提供了一条极富创意的解决途径。

陈先生拿出地图,向记者展示了长江口亚三角洲的美好前景。他说,前几年在长江河口南港—北槽深水航道,建成了两条向河口外伸各近50公里的导堤,这—强大的人工干预行动,极大地改变了长江河口原有的动力结构。依托这两条